第三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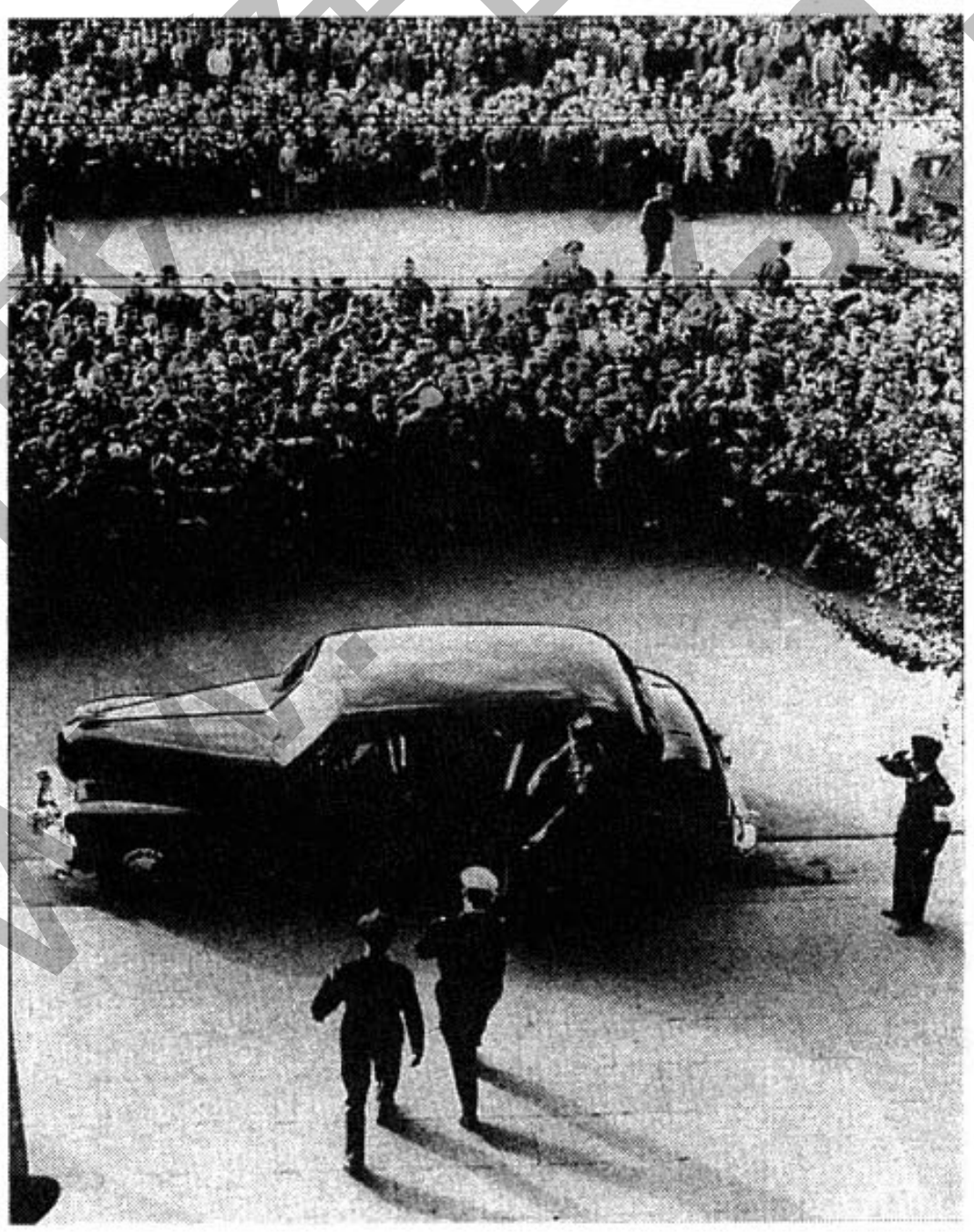
革　　命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第六章
新殖民主义革命

在日本人看来，“自上而下的革命”并非史无前例。自十九世纪中 203
叶以来，统治精英们就一直在敦促民众进行产业化、现代化和西方化，
诀别过去，成为新的男人、新的女人，成为新诞生的民族国家的新国
民。从 1868 年开始，政府就明确以欧洲导向的“文明开化”为目标，
贯彻了广泛的改革措施。自 1880 年代起，国家在天皇制更为保守的、自



麦克阿瑟将军的超凡魅力，在战败的日本人心中，正如他的权威一样崇高。

上而下的庇护之下，积极推进现代国家的形成。甚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军部和文官的独裁者们，也曾在革新主义与革命的名义下，实行他们的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政策。

依靠强制下达的专制主义指令而戏剧化地改变现状，这并非是什么新鲜事。这一点有助于解释——尽管只能部分地解释——为何美国人的改革措施能够奏效。麦克阿瑟将军，作为典型的美国人，轻易成为了日本政治盛典中的主要角色：新的君主，蓝眼睛的幕府将军，家长式温情的军事独裁者，浮夸而又极度真诚的歌舞伎男主人公。麦克阿瑟以全副精神扮演着这一角色。正如天皇和江户时代的将军们一样，他安坐在
204 他的司令部里，从不与人民大众接触，仅允许高官贤达前来晋见，骄横地颁布法令，而且绝不容许批评。

作为殖民总督的胜利者

这位最高司令官从未真正看到过他所莅临主政的日本。自他到达东京的那一刻起，他的活动就限定于每日早晚的通勤路线：从他位于旧美国大使馆的住所到附近的前第一生命保险大厦里的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办公室。他从不与日本人交际，而且，据他亲近的一位人士观察，“只有16位日本人跟他说话超过两次，而且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职位都不低于首相、最高裁判所长官或是最大的大学的校长这一类的人物”。麦克阿
205 瑟将军的傍晚，大部分都在观看好莱坞电影中度过，尤其是西部片。间或他也观看一些由美国军方摄影师拍摄的关于日本的新闻纪录片，使他至少在银幕上跟他所统治的国家保持关联。

5年中，麦克阿瑟将军的活动就像一架节拍器那样可以预知。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他仅离开过东京两次，对马尼拉和汉城进行了短期访问。正如1946年以前的明治天皇一样，麦克阿瑟以亲切的、家长式的语气谈起，上千万日本人在他的庇护之下的感受与成就，却从未与他们有过哪怕是最轻微的有意义的接触，从未亲自观察过他们实际的生活情形。这位将军凭借崇拜发迹，深信“东洋的精神”乐于“奉承胜利者”，并且假定只要他一说人民就会相信，民主就会落地生根。而事实的确如此。大批日本人的反应是，最高司令官真伟大，民主真伟大。[1]

麦克阿瑟在被占领的日本是无可争议的最高领主，他的下属们则都是小小的殖民总督。总司令部活动的核心，位于东京市中心未被轰炸的地段，在那里美国的军事和文职官员们（1946 年早期大约有 1500 人，1948 年 1 月上升至 3200 人），操纵着由充满活力的参与者西奥多·科恩（Theodore Cohen）恰如其分地概括的“新的政府之上的政府”。这一超级政府解释并推进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同时推行“非命令与命令具有同等强制力”的斡旋艺术。即便是总司令部的中层人员向日本官员所作的提议或者劝告，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并非命令，但是仍然会被有效地执行。麦克阿瑟的副官法比昂·鲍尔斯（Faubion Bowers），如此描述这位专横的将军：实际上他专心致志于“要求、主张、强制、禁止与刺激”的政策与时常“变得滑稽”的基本行为模式。[2] 在占领过后，当日本官僚当局表现出擅长这种“行政指导”之时，美国人反而指责，这种习惯是日本人的癖好。这种新殖民主义革命的独裁主义的遗产，是很难被承认的。

总司令部超乎寻常的中央集权，不仅依靠遍布全国的文职与军职人员实现，而且还由教育体制和日常文化直接干涉，因而更加完备。胜利者敏锐地意识到，富于意义的民主化，不仅仅涉及简单地促进法律和制度的改革。同样重要的是，正如最初的一位占领方针的规划者所言，要“触及每一位日本人，重塑他的思想与感情的方式”，以提升对自由与民主更为深刻的认识。[3]

为达成这一目的，占领当局设计创造了一套教育网络，以触及日本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童。他们派遣美国人组成的小队，主要由男人组成，间或也有一些妇女，深入各地社区，提供民间的美式公民教育。到 1950 年左右，他们要求所有学校的教科书必须译成英文，以备他们审查认可方能使用。[4] 他们极力影响大众媒体，消极的办法是通过审查制度，积极的办法是主动在报刊发表的文章、电台广播的节目以及电影院放映的国内外电影中进行宣传。

显而易见，以专制的方式实现民主，在每一个层次上都十分困难，而且很容易被占领军当局人员所滥用，因为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拥有了在自己的国家永远不可能梦想掌握的权力。一桩接一桩的案例，证明了这种权力可以多么地诱人。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为确保在广播电台这一

至关重要的媒体中只有“民主”一种声音，占领军当局选择由国营广播电台（当时命名为“NHK”，效仿 CBS 和 NBC），永久性地垄断全部广播频道。他们对这种自上而下的统筹规划如此固守己见，以至于到了 1950 年，总司令部还在故意妨害作为竞争对手的商业电台的发展。改革者们相信，只有通过这样严密的控制，典型的“日本佬”才能被塑造为美式民主上好的复制品。[5]

这种殖民总督角色的职责，远远超出了制定政策本身。庞大的占领军部队——包括军官和他们的家属，最高统帅部的文职人员及其家属，加上最终接近 100 万的普通美国大兵——构成了一个特权集团、特权阶级和特权种族。他们组成了一个在日本的“小美国”，的的确确地存在于东京的中心地带；而且他们实行明确的种族隔离政策。岁月荏苒，当冷战升级、核军备竞赛加剧，欧洲列强努力在东南亚重建自己的势力范围，共产主义者在中国显然已经获胜，而战争在朝鲜爆发——美国人在战败国日本的统治却岿然不动。1947 年新宪法生效，日本人从理论上成了公民，不再只是他们天皇陛下的臣民。然而事实上，他们却继续是占领当局的臣民。

207 毫无疑问，许多占领者表现出感人的理想主义与慷慨大度的精神。美国大兵们因为他们随时的友善与自发分发巧克力和口香糖的举动而闻名。有些美国人表现出对日本文化严肃认真的兴趣，以及对陌生人的责任感，这是他们的日本邻居所不熟悉和感觉吸引人的地方（或者有时只是感到古怪）。他们送不相识的人去医院，而且做好事不图回报。他们单纯地施行善举，不计报酬，实事求是。[6]

占领者还给予他们的新臣民以可观的实惠，例如：青霉素、链霉素、血库以及名副其实的公众图书馆。还有比如教授一些实际的技术与质量管理的统计方法等，这些终将对日本的经济重建产生极大的价值。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一些美国人和日本人建立起了各式各样亲密的个人关系。然而说到底，这样的关系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恰恰部分是因为，这是对军事占领下不可避免的不平等双边关系的挑战。而且即使是这样亲密的个人关系，也通常有赖于美国文化优越性的假定。极少有例外，所有交际几乎都是以征服者的语言界定和进行的。

对美国人优越性的日常提醒是无处不在的。在战败国出现最多的一

句话，往往张贴于公众场所，并在无数的公共或私人场合中被重申，那就是“根据占领军的命令”。事无巨细都要由总司令部的训令管理支配，并且被冗长繁琐的文书工作以及相关的具体处理所拖延。众多的商店、剧院、宾馆、建筑物、列车、地区以及像高尔夫球场这样的休闲设施，被标明日本人“禁止入内”。最高统帅部的普通军官和文职官员，他们在美国只可能过着平凡的中产阶级生活，在日本却住着从房主那里征用来的高级住宅，这实在算不上尊重别人权利和财产的令人信服的例证。他们可以雇佣三个、四个、五个甚至六个仆人，都由日本政府掏腰包（厨师、男仆、女仆、花匠、保姆以及洗衣女工，被认为是一份理想的仆役名单）。法比昂·鲍尔斯，这位狂热的歌舞伎迷恋者，设法得到了两位私人厨师，一位做西餐，另一位烹饪日本菜。他后来沉思说：“我和我认识的几乎所有占领军人士，都极端自大和傲慢，并且对我们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7]

东京市中心几平方公里未被轰炸过的地区，成了众人皆知的“小美

这张 1947 年 8 月美国海军的照片，是表现占领军人员舒适生活的一组照片中的一张。文字说明如下：“没有人议论在日本横须贺的 125 个海军家庭高昂的生活费用。每月支付 27 美元，他们就拥有 5 到 7 个房间的住所，全套家具、电器、电话、冰箱和仆役。”日本人可能会发现这个早餐场景有点奇怪，因为右边的女仆身穿在这个场合显得太过隆重的和服。

国”。从 1945 年 12 月开始，圣诞节的装饰每年都出现在那一片街道，几乎是与最高统帅部的指令命令日本国教神道教与国家彻底政教分离的同时出现的。美国国旗在外国人接管的无数大厦上飘扬，与此相反，悬挂日本国旗日之丸（美国大兵俗称的“肉丸子”）却被严格限制，而且唱日本国歌也是被禁止的。1948 年 6 月，横滨的一位日本男子因为不适当地悬挂国旗，被判处拘役 6 个月。[8]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小美国地区工作和娱乐。他们将街道和建筑重新命名（例如，那儿有一条麦克阿瑟林荫大道和一座 Ernie Pyle 戏院），到处塞满了吉普车、军用汽车以及从美国船来的新式轿车。一幅日常图景完全反映出了日美之间的关系：在繁华的日比谷街头，一位美
209 国军警和一位日本警官共同指挥交通，日本警察总是跟在美国警察之后打信号。据一位美军上校的妻子回忆，在小美国地区“我们可以从一端走到另一端，总是有美国面孔或是美国汽车映入眼帘”。这赋予占领者们一种亲近感和安全感，而且与周边“残灰冷烬、破铜烂铁绵延堆积数十里的荒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他们的臣民正尝试着重建自己的生活。[9] 对有些人来说，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无可逾越，而且理当如此。一位在占领当局担任文职雇员的女士，肆无忌惮地回忆说：“对我来说，在我们光辉明亮的占领军宿舍、办公室和铁路客车之外的世界，挤满了从尼伯龙根式的东方魔界中钻出来的扭曲丑陋的生物。我时常想，自己必定是狠狠地盯着他们，就像他们目瞪口呆地注视着任何一位征服者主子一样。”[10]

当日本人仰赖黑市得以生存，美国人却在美国陆军消费合作社与物资供应所购买琳琅满目的日用百货乃至奢侈品。那位上校的妻子回忆道：“在消费合作社门外，总是挤满了日本人。他们观察顾客们进进出出，将鼻子压扁在橱窗上朝里张望，静静地、敬畏地凝望着陈列的货物：纪念品、糖果、照相机、奶昔、鞋子、羊毛衫、丝质和服以及货真价实的东方古玩。”衣衫褴褛的旁观者们，静静地看着美国人满载着“十五磅重的肉块、五十磅重的米袋以及大大小小的水果和蔬菜罐头”摇摇摆摆地走出来。偶尔，这位官员的妻子在往吉普车上装食物时，会故意将几块新鲜的烤面包碰落在地，以便于那位好像总是在场的、瘦小而眼神空洞的男孩，捡起来并匆匆逃离。甚至连芥末也是一加仑罐装

的，显然超出了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的需求。但是“仆人们会拿勺子舀着吃掉，而不会让它坏掉”。法比昂·鲍尔斯每天清晨都会被一位仆役长造访并被问询：“您需要什么吗?”在他花样翻新的重述中，他是这样回答他的仆役长的：“十八只鸡和三整只火腿!”鲍尔斯解释说，他的应酬款待很多，但是许多供应也“填进了那些饥饿的歌舞伎艺人们的腹中”。[11]

正如在任何殖民飞地一样，占领军中的某些人士拥有过分的权利。麦克阿瑟深为器重的助手考特尼·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战前是他的私人律师，以陆军上校的军衔竟然担当起盟军总部民政局局长之职，而且在以下方面都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力：监督日本政府公职人员的整肃、天皇与帝制政策、宪法修订以及一切有关内阁、国会、选举制度、法庭和行政的事务。与之相匹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威廉·马夸特（William Marquat）少将的权力。在作为麦克阿瑟仰赖的助手崭露头角之前，他曾是一位职业拳击手、新闻记者和专攻防空战略的下级军官。被任命为经济科学局局长之后，马夸特担当的职责不亚于全面指

在胜者与败者之间的每一次实际接触中，人种和特权的等级关系都显而易见。这些美国大兵，坐在昔日战场上的敌手拉的人力车上，正摆好姿势配合一位美国军队的摄影师在日本皇宫前照相。

挥财政、经济、劳动和科学的发展，包括解散财阀控制的公司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非集中化。日本政府的各个主要财政和经济机构都要向他的部门汇报，包括大藏省、商工省、日本银行、经济安定本部、新设立的劳动省、商工会议所乃至于新成立的通产省。[12]

211 在这个命令系统的末端，二三十岁的美国年轻人，既缺乏实际经验又不懂日语，却被授权教导年长很多的日本人如何履行职责并且重整思路。这些根本不懂外语的人，依据英语水平判断与他们交往的外国人的智力，并嘲笑别人说英语的瑕疵。被控告对日本人犯了罪的美国人，交由他们自己的政府审讯，不必在地方法庭出庭，而他们的罪行也不会在媒体披露。当然，对于外国领主们的任何批评都在被禁止之列。公众媒体既不允许对最高统帅部的政策方针提出异议，也不允许对任何同盟国进行负面报道，甚至不许提到自身是在这样的限制之下运作的。

尽管与日本军队在其亚洲占领区的行为相比，胜利的同盟军通常要自律得多。但不可避免的是，袭击和强奸事件仍有发生。此类事件都未在媒体曝光，甚至不少案件也没有报警。受害人根本就不相信可能得到公正的赔偿。占领期结束后，发行量庞大的杂志纷纷刊登文章揭露美军人员的强奸罪行，而日本男人们也愤恨地回忆起在公众场合无端遭受的暴行。[13] 占领军有关人员，包括外国记者，通过赠与日本女人罐头、巧克力、尼龙丝袜、香烟和酒等礼物去享受性的乐趣，羞辱并激怒着日本男人。美国大兵们自以为是深谙“贝贝桑小姐的世界”的行家里手，而且他们认为这个带有种族色彩的称呼很有趣，开玩笑说这使他们对日本有了独特的“见解”。还有一些人以蔑视的口吻说起“东洋妞”。混血儿成了占领时代一种无法言说的悲惨故事——既难以得到外国父亲的承认，又总是被日本人排斥和放逐。[14]

正是在如此种种罄竹难书的情形之下，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的矛盾清晰地显现出来：虽然征服者鼓吹民主，事实上他们却依仗律令行事；虽然他们拥护平等，自己却组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阶级。他们改革主义的议程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西方文化及其价值，实质上一律要比“东洋的”高级。同时，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几乎所有的交流，都发散着白人至上主义的气息。尽管占领日本是在独特的“美国式”的打破旧习的历史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一直伴随着西

方列强的世界扩张、带有种族差别的家长式的温情主义的新形态而已。像他们的殖民主义者前辈一样，胜利者们满怀着显而易见的“白人的义务”的使命感。他们谈论着对臣民们进行启蒙教化的职责。在他们看来，自己承担着种族、信条和文明的重任。他们傲慢自大，而且令人羡慕地没有自我质疑的烦恼。 212

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不会对等，但是这种不平等混合了独裁主义的习惯，这是美国行事惯例的重要部分，根本无视日本的现状。首先，日本承受的占领军美式的行政组织，本身就是以难以想象的、极其严格的等级方式建构起来的。毕竟，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是一个军事官僚机构，与民主制衡的原则根本对立。官兵之间的阶级区分明确，而每个人在司令部的指挥系统中的“固有位置”，都有精确的规定。妇女被排除在这个统治机构的中枢之外。黑人则被隔离并且归入下级职位。

独裁主义统治的工作模式与占领军政权贯彻指令的方式相结合，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与在战败德国采取直接的军事统治相反，占领日本是“间接”实现的。也就是说，通过现有的政府机构进行操作，从而蒙受了日本战败之前两种最不民主的政治体制相互依存所造成的影响：官僚体制和天皇制。就改革的基本议程自身而言，依靠已经存在的政府机构的决定，是在最后关头才正式形成的。直到占领军到达前夕，麦克阿瑟和他的班底还在代号“黑名单”的秘密指令下运作，以便建立直接的军事统治。这些计划在《日本投降后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文件中改变了，文件明确规定“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政府机构及诸机关，包括天皇陛下在内，行使权限，以便满意地达成促进美方目标实现之目的”。[15]

这种根本方针的改变背后的基本宗旨，是出乎意料的实际理由：占领军缺乏语言能力和专门能力进行直接统治。原则上，假使得到华盛顿上司们的正式许可，最高统帅保留改变现存政府机构、让天皇裕仁退位、甚至废除天皇制的权力。实际上，这些选项从未被认真考虑过。尽管日本的军事组织被消灭，镇压性质的内务省解体，但是官僚体系本质 213
上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天皇也被保全了下来。美国殖民总督们如此倚重本土的官僚阶层来贯彻他们的指令，以至于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

庇护下，日本的官僚机构实质上获得了比它们在战时的国家总动员的巅峰时期还要大的权限和影响力。[16]

最终，作为这个新的民主国家至高无上的象征，麦克阿瑟专横的个人角色，将被转移回那位天皇身上，他的统治贯穿起这些年的压抑、战争和残暴；而且即便是在占领军撤离之后许久，最高司令部的“超级政府”式的操作方式仍然会延续，终将通过官僚机关的那些官僚们保留下来。尽管如此，当这些以锐意改革的总督大人的姿态莅临的胜利者们离去之后，日本终将成为一个不同的国家。只有像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格列佛游记》的作者）那样充满想象力的人，才能做到对这样不可思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回环往复进行正确的理解。而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已。

对“猿人”的重新评价

对日实行民主化的设想，是对战时的美国宣传进行大大修正的结果，当时美国媒体无一例外地将所有的日本人描述为孩童、野蛮人、虐待狂、疯子或是机器人。在最普遍的非人化比喻中，日本人被描绘成猿，“患黄疸病的狒狒”，或者最常见的就是“猿人”（monkey-men）。不像有所谓“好的德国人”的说法，公众意识中缺乏所谓“好的日本人”的概念。战时美国对超过十万日裔美国公民和居民的强制收容，几乎没有引发什么抗议，就是此种敌意的明证。当德国被打败，纳粹集中营曝光之后，在美国陆军部拍摄的教育影片《向东京进发》（*On to Tokyo*）中，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George C. Marshall），特意强调日本人的“野蛮行径甚至超出德国人之上”。仅仅在日本投降前数周，美国陆军部《了解你的敌人——日本》（*Know Your Enemy—Japan*）一片中，日本人还被无情地描绘为毫无个人特征的民族，就“如同一张底片洗出来的照片一模一样”。[17]

这些事实，使得一场民主革命并不那么令人充满希望。一旦美国的政策从杀掉“猿人”转而变为将他们改造成民主国家的公民，那么，就不仅需要对日本人进行再教育，也需要对美国公众进行再教育。战争时期贬低性的和非人化宣传的陈词滥调必须加以纠正。例如，当美国仍然假定在战败的日本将强制实行直接的军事统治时，在加州民政事务驻军

基地受训的美国人使用的教材，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在战争的白热化阶段，日本人通常被视为背信弃义、残酷暴虐和狂热盲从的“猿人”。

在不同的时期，他们的个人甚至是集团，的确曾表现出这样的特性，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和偷袭珍珠港事件就是证明。这里并非是想为日本人辩护或者开脱，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想象所有的日本人主要都是“猿人”类型，则是错误的。这就如同将所有的美国人描述为通常都参与暴民的私刑、黑帮犯罪和种族骚乱一样。

民政事务指导员继续解释说，“对日本人性格较为现实、平衡的认识”，不妨将他们的背信行为视为一种西方观念的极端体现，即“爱情和战争是不讲手段的”。在这点上，日本人只不过是走得太远了，而且他们不理解或不赞赏西方式的公平竞赛的精神。至于说到战争中日本人的残暴行径，可以理解为长期受压抑者的突然爆发。用军用手册上的话来说，就是“温顺、谦恭的小日本，一旦穿上军装，受过无情的训练并任其发泄的话，由于生平第一次有机会表现自我，很可能就变得完全疯狂，沉溺于脱离常轨的恐怖凶暴的放纵之中”。然而事实上，被轻蔑的“猿人”，与其他民族的差异并非如此之大：

他们还有其他的性格特征：诚实、有创造性、勤劳、节俭、勇敢、好斗、正直。当然也有例外，个体之间依据性格、性别、年龄、社会地位、收入以及职业等的不同会有所差异，日本人平均表现出的性格特征，则与其他国家的其他民族大致相同。[18]

美国读者尤其是被赋予占领使命的军人使用的其他教材，也同样尽力传达“小日本”是跟他们自己差不多的人的观念。1945 年 11 月，当美国陆军部发送一部教育短片《我们在日本的任务》（*Our Job in Japan*）给盟军最高统帅部，以便为占领军部队放映时，占领军军官们要求删改 215
影片，因为它还是蹈袭战时对日本人危险而不值得信任的描绘。此片的修订版于 1946 年初上映，日本人发动的“令人厌恶、猥亵的”战争的

恐怖影像被削弱了。影片结尾数分钟的一组镜头，拍摄的是友好的美国人与有魅力的、真诚的日本妇女和孩子们在一起交流的场景。[19]

《我们在日本的任务》是以这样的观察开始的：日本人是“被训练遵从领导者”的民族。胜利者遇到的麻烦，可以用一句话表述：日本人的头脑，既可以“制造麻烦”也可以“明白事理”。观众们先是看到一位日本男人头部剖面图的特写镜头，然后看到头盖骨中充满了海绵状的大脑，这个影像逐渐放大，直到巨大的人脑占据银幕的中心，漂浮在无数其他更小的大脑所组成的背景之上，就像是挤在盒子里的许多豆子。解说员的画外音：“我们的问题存在于日本人的头脑里。日本有七千万这样的头脑，在物理性质上与世界上的其他大脑没有区别，实际上都是与我们头脑的同样材料构成的。这些头脑，就像我们的头脑，可以做好事（此时，画面出现一位白胡子老人，看上去像是在基督教堂里），或是做坏事（这时银幕上是一幅著名的战争暴行照片：一个日本人将一个跪着的金发士兵斩首），这些都取决于输入头脑中的思想观念。”

贯穿影片的始终，那个巨大的人脑反复浮现，告知美国大兵观众们这样的信息：战争中日本人可怕的行为模式，都是“军阀”和“军事集团”的教导所致。通过将古老的神道教信仰变成现代教化的武器，军国主义者们使那个头脑中充斥着“古老的噩梦”和“古老的仇恨”、“血腥的神话传说和异教的迷信”、“黑暗的过去的咒语”。当解说提到“一个古老、退化、迷信的国家”时，画面上出现了民众在佛寺外烧香的场景。

在战时的宣传片中，标准的做法是通过表现日本人“最为奇特的”行为所造成的不和谐的蒙太奇镜头，传达出敌人的异质性。譬如拍摄季节祭祀和传统舞蹈场景，人们穿着奇异的服饰，伴奏音乐使西方人听起来既单调又刺耳。《我们在日本的任务》沿袭了这一惯用技法，但是解说者顽强的声音，持续强调的却是另外的一个基本主题：所有的日本人都被灌输相信，“天照大神创造日本人，去统治世界上其他所有的民族”。此观点被认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也被打印在了银幕上。事实上，尽管日本领导人从未企图“征服全世界”，这却是美国战争时期最主要的宣传，而且他们也不打算此时加以更正。与此相反，它被断定是“贩卖到日本人头脑中的”最基本的理念。然后接下来，这一点又明确了胜

利者的任务。解说员吟诵到："今天，这个同样的头脑中还存在着这一问题，我们的问题。这需要我们的时间，这需要我们的努力。但是我们决心让他们了解这样的事实：这是日本最后的战争。"作为强调，最后的这句话再次占据了整个银幕。

对战败国日本转而实行非军事化的方针政策已经在进行之中，影片突然变得抒情起来，这的确反映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更为积极的见解的需求。影片中放映着微笑的美国大兵与身穿和服的女子交谈，她们不再在奇异的舞蹈中旋转，也不再用鼻音歌唱。大兵们与诚挚认真的日本男孩一起读书，从娃娃般漂亮的日本女孩手里接过鲜花。解说员宣布，美国人会警惕并且强硬地对付狡诈的骗子，"但是对于那些正直的人、真诚的人、的确想要明白事理的人而言，他们将会获得所需的每一个机会。同时，这些民众，这些正直的好人，正指望我们帮助他们证明，我们的观念比日本的观念更好"。美国大兵们被告知，他们的任务是只需要显得自然真诚即可：

> 通过自然真诚的展示，我们就能证明什么是我们所说的美国方式，或曰民主，或曰简单的、古老的金科玉律般的常识，是一种多么不错的生活方式。我们就能证明，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想摆布别人，即便是当我们恰好处于领先地位之时。我们就能证明，我们确信每个人都应当得到公正的待遇，无论种族、信仰或是肤色（这时，两位美国黑人士兵的形象掠过银幕，黑人形象在此前或此后的影片中再未出现过）。

《我们在日本的任务》简直是对美国"白人的义务"式的正义使命的完美诠释，更不用说那种高洁的宣教精神了。影片概括说，这是美国的使命，让日本人读到、谈到和听到真理，而且"当他们读到足够的真理，当他们听到足够的真理，当他们对真理有了足够的亲身体验，他们就能以一种建设的、和平的方式自己生活"。当银幕上自由的钟声敲响，解说员做了总结陈辞：

> 我们来，是为了让日本人的头脑清醒地认识到，从现在起，我

们已经再也不能忍受这些血腥野蛮的行径。我们来，是为了让日本人的头脑清醒地认识到，现在是明白道理的时候了——现代的、文明的道理。这就是我们在日本的任务。

这部电影的许多胶片，除去结尾一片废墟的被占领的日本的影像，都是从以前的战时影片中剪辑出来的。与《了解你的敌人——日本》这样的宣传片比较，显而易见本片删除了对天皇的批判，显示出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信心——天皇的头脑也是能够进行民主化改造的。然而这部电影的最惊人之处，除了它不断怪异浮现的大脑图像，则在于它根本性的乐观信念：既不是血统、文化，也不是历史驱使日本走向战争，而是近年来政府的社会统治和思想教化使然。因而，再教育事实上看起来也就不是那么难以达成的任务了。日本投降后4个月，周刊《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一篇文章的题目，简洁地捕捉到了这一新的观念："The G. I. Is Civilizing the Jap"（《美国大兵以文明教化日本佬》）。[20]

专家与顺从的畜群

通过将日本人刻画为"被训练遵从领导者"的民族，美国陆军部的影片，接续了对日本的民主发展颇有微辞的保守派观点。在那些声称对日本有专门了解的英美精英人士看来，这一观察实质上就是真理。这些专家中的许多人拥有这样的逻辑：任何自上而下推行民主革命的观念，都是荒唐可笑的。几乎毫无例外，这些"旧日的日本派"首当其冲地轻视普通日本人自我统治的能力。

在华盛顿，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战时日本问题专家是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他是1931年到1941年间的驻日大使。1945年5月，格鲁告诉杜鲁门总统，不可否认天皇制是封建制度的遗留物，"长远看来，我们在日本最好的期望是发展君主立宪制，过去的经验表明民主在日本不会成功"。尤金·杜曼（Eugene Dooman），一位日语专家以及格鲁的日本事务的关键性顾问，同样强调日本是"一个共同体社会，是一个阶层社会，社会结构的上层确定意图和目标，下层民众遵从之"。天皇处于社会阶层的最高位置，作为"日本民族人种连续性的活

证明”，担任着提供社会一体性的凝聚力的至关重要的角色。约瑟夫·百伦坦（Joseph Ballantine），美国国务院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精通日语的专家，认为提出新的日本政治领导的理念是滑稽可笑的，因为普通日本人只不过是“惰性的并且受制于传统”。[21]

英国的亚洲问题专家们也同样倨傲。例如，在日本投降之前，享有盛誉的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发布了一份有影响力的报告，将日本民众称为“顺从的畜群”——这是当时的标准说法，并且表达了对“日本人运作民主制度的能力深切的疑虑”。在占领日本的初期阶段，以讲一口完美的英语而闻名的日本前驻英大使币原喜重郎组阁。驻日的英国代表趁此时机，向英国外务部拍电报说，日本人“像任何非洲部族一样，完全不适于在现代世界中实行自治，然而却更加危险”。[22]

这种观点，在新闻记者和学者的著述中流传甚广，他们也都是有名望的亚洲事务专家。这反映出问题的复杂性，而不仅只是对“顺从的畜群”或者“巨大的蜂房”（这是对日本民众的另一种宠物式的比喻）的自我种族中心主义的轻蔑而已。许多西方专家，尤其是外交官，在自己相当一部分的职业生涯中，周旋于日本的上流社会圈子。当他们轻蔑地谈论普通日本人的自治能力时，不仅反映出他们自己的精英主义倾向，而且也反映出他们的日本友人们反复表达的对天皇制的崇敬之情以及对“大众”的可怕的轻视。[23]

假使这些昔日的亚洲专家当道的话，引人民主革命的理念早就会因嘲笑而夭亡。实际发生的是，这种嘲笑被另一派专业人士的见解拨转了方向。他们是强调日本“民族性格”的“适应力”的行为科学家，以及自由派与左派的策划者和政策制定者。他们真诚地相信民主价值的本质和要求的普适性。尽管行为科学家与自由派以及左派之间的观点有对立，前者强调“日本人的独特性”，后者注重民主的“普遍性”，但是二者都为民主制度可以真正在日本扎根提供了乐观的依据。

219

战争时期对行为科学家的动员，吸引了相当一批英美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进入情报分析和心理战争的研究领域。到战争的最后一年，他们的工作已经推导出如下结论：日本人的性格是钟摆式的，可以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而能够由狂热的军

国主义，转向某种真正的民主主义。有关这一主题，在秘密机关的谍报书中有无穷无尽的阐释，所有报告本质上都是在想方设法将个人的临床心理学发现，强行推广为对日本民族的整体性见解。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证明此种思想将会导致何种后果。1944 年 12 月，美国作战新闻处（OWI）准备的一份例行公文评述说，“日本的文明模式，看起来最接近于神经强迫症的临床症状”。据说，这种强迫症明显表现为日本人对“仪式与禁忌”的关注、受虐狂、受挫折的暴力性反应，以及“全体性的行为僵化”。涉及占领军未来的政策问题，这份诊断书最为意味深长的“实际的结论”，包含在 OWI 调查员提出的疑问之中：“是哪些个人和社会集团设定了思考和行为的模式，以利于其他日本人加以模仿？”[24]

对这种疑问的现实反应有几种类型。最有名的当数 OWI 的情报组成员、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分析：日本人据说依照境遇状况或者特殊的伦理而行事，这与所谓的西方传统的普遍价值有悖。同一个人在某些情境中可能是礼貌宽容的，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则可能粗暴冷酷。关键取决于社会关系和个人在每个情境中的指定任务。而在例外的境况中，任务和限制未被规定，个人没有价值核心，没有明确主体化的自我可以凭依。

分析进一步指出，更为显著的是，日本人对权威的顺从反应。这是社会科学家对“顺从的畜群”更为谨慎的说法，而且这将很快为在天皇的庇护之下推进民主政策的合理化提供良好的基础。OWI 的分析家们，比如后来学术声名卓著的克莱德·克拉孔（Clyde Kluckhohn）和亚历山大·莱顿（Alexander Leighton），他们主张，作为日本至高无上权威的
220 天皇，根本上就是个空虚的容器而已。就像天皇可以作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化身被供奉一样，他也可以变身为某种帝制民主的象征被追随。这一切似乎都已经被美国处置日本战俘的经验所证实。许多日本战俘都是被强行抓捕，或是在伤重、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被俘，因而无法顽抗到底或者实施自裁。然而，作为战俘，他们很快对逮捕他们的人表现出驯良和顺从，甚至协助向他们昔日的战友起草劝降书。这些经验使分析家们更加确信，通过一种权威、实例和象征操作的巧妙组合，胜利者们可以提供一种“民主”模式，尽管温和，却可能是战后日本人所寻求仿效的

目标。

这种修正过的谨慎的乐观主义很快就受到了挑战。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回溯起来，太平洋战争的最后半年，不仅充分暴露了天皇政府的残暴愚行，而且无益地延长了冲突，反而激起了华盛顿方面出台更为激进的占领政策。假使日本在 1945 年初就投降的话，就像天皇被身边某些顾问所强烈敦促的那样，日本不仅可以躲过空袭、原子弹爆炸以及超过百万民众的死亡，还很可能避免自上而下的占领期革命。在 1945 年初，并没有在战败的日本引进民主革命的计划。那些当时仍然控制投降后计划的旧日的日本派，顶多期待的是稳健的改良议程而已。

更为进步、更少种族歧视和文化侮辱意味的建议，最终形成了对日本投降后的政策。这些建议来自于几个相互间有所交叠的集团：拥护罗斯福新政的自由主义者、左翼和更为亲中而非亲日的亚洲事务专家。随着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罗斯福新政的拥护者们，在国内事务上的影响力逐渐式微，因而将他们的信念寄托于民主理想、民主渴望和民主政策的普适性上。这种“普适性”认定，各国的民众在根本上都是一样的，而理想的政府只有一种，即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拥护新政者支持的民主化的基本原理所包含的要素之一，就是经济民主。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积极鼓励劳工组织，反对经济力量的过分集中，并致力于确保更为公正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政策。另外，当然新政的拥护者们也不介意支持干涉主义的政策以达成他们的目标。[25]

正当拥护罗斯福新政的自由主义者们尽力淡化日本文化的局限性之时，一种更为激进的分析思路，引起了对日本底层存在的真正的民主潜力的注意。这种观点见诸于左翼出版物比如《美亚》（*Amerasia*），还有太平洋问题调查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期刊《远东文摘》（*Far Eastern Survey*）和《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上。左翼人士公开谴责支持天皇和保守派官僚的绥靖政策。同时，他们为下层社会群体的革命潜力鼓掌欢呼。而在旧时的日本派眼中，下层民众不具备民主能力，更坏的是，却很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煽动影响。

按照《太平洋事务》著述颇丰的编辑者毕恩来（T. A. Bisson）的观点，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这样的日本男女：“他们曾经领导过 1941 年前被镇压的政党、工会和农会”，而且“曾经公开地、毫不含糊

地反对战争，可能由于鲁莽坐过牢，饱受摧残”。毕恩来强调说，只有这样的日本人，才能够建立真正“植根于民众意志并致力于民主和平”的新秩序。[26] 年轻的左翼研究者安德鲁·罗斯（Andrew Roth），于 1945 年 9 月出版《日本的困境》一书，这本书有时被呼为占领初期激进改革者们的“圣经”。罗斯在书中同样强调，真正的民主潜力，在于工人、农民、被征兵入伍的学生、小店主、政治犯、曾经被变得残忍而又醒悟的退伍老兵，以及从前在中国的战俘，他们受到过日本共产主义者，如延安的冈野进（野坂参三的化名）和重庆的鹿地亘等人“反法西斯主义”再教育的影响。[27]

随着太平洋战争进入最终阶段，这样的观点在政府和新闻界更加突出。同时，日本专家日益被视为日本保守派主张的代理人，以及被战前日本的特权阶层过分优雅柔顺的手段灌醉和迷惑的人。在美国国务院，这种对“日本派”的批评，首先来自与中国事务相关的人士的发难。这些“中国派”，对日本文职官僚的批判更加严厉，对打破日本统治阶级掌控的组织制度，释放下层的民主力量的可能性更为乐观。除了其他的保守观点，他们还断然拒绝日本派将财阀领袖描述为“稳健的”实业家，并强调现存的经济制度本身就是“战争根源”之一，应当被连根拔除。

最广为人知的“中国派”观点的公共发言人，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他是一个卓越的、有点辛辣的中国与中亚问题的学者。拉铁摩尔是个背景显赫的人物：在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学任教，战前是《太平洋事务》的编辑者，珍珠港事件后为美国作战新闻处工作，而且是美国国务院的常备顾问。普通读者对他的了解，是由于 1945 年他出版的一本简短的、带有论争性的著作《亚洲的解决》（*Solution in Asia*）。在书中，他痛彻批判了“日本派”。在他看来，战后亚洲“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日本彻底的民主化，连同全亚洲领域的经济实力最大化。不然的话，日本迟早会重蹈剥削掠夺式的帝国主义政策。日本赔偿是提升全亚洲经济水平的手段的第一步，日本经济的非集中化则是另一重要手段。[28]

当然所谓“日本派”和“中国派”，只是在展望日本民主前景的复杂斗争中，使用的象征性的称谓。大部分论争是在华盛顿的幕后发生

的，而且直到大战结束前数周，事情才发展到紧要关头。当时，对格鲁以及他的追随者们的批判派，在美国国务院取得了胜利，并获得了美国陆军部的支持。一位陆军部长助理约翰·J. 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与批判派们有同感，由他主持对日基本方针的修改和定稿工作。这种势力消长的变化，反映出官僚体制内部更为广泛的政策斗争，也部分地与罗斯福总统逝世后的权力交替有关。[29]

标志着保守的日本专家失去权威的时间，可以被精确锁定。1945 年 8 月 11 日，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取代格鲁成为副国务卿，而艾奇逊旋即发表的关于根除将日本导向“战争意愿”的势力的评论，反映出他对于更为激进的改革主义者们的认同。日本派视为奇耻大辱的是，美国国务院为麦克阿瑟指定的第一位政治顾问，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小乔治·艾切森（George Atcheson Jr.），而非国务院的资深日本事务专家，比如杜曼（Dooman）或者百伦坦（Ballantine）。此后数年间，定期往返于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顾问团，总是由精选的情报专家构成，其中却难觅日本专家的身影。

在东京的盟军总司令部，日本专家也同样显著地缺席。最高司令官 223
本人，以他独特的方式给出例证。从许多方面来看，麦克阿瑟都是一个最具种族优越感的人，喜好不同寻常地概括所谓“东方”人格。1945 年 10 月中旬，一位访问东京的特使向杜鲁门总统报告：“（麦克阿瑟）将军声明说，东方人具有一种自卑情结，使得他们在战争胜利时会‘像孩子般的残忍’，在失败时则会像奴隶般地顺从和依赖。”然而与此同时，麦克阿瑟也能慷慨豪迈、不着边际地赞扬“种族的特性”，甚至在战争中，他也经常从容地阐述“在此后的一万年间，太平洋周边国家的十亿居民，将会决定人类的历史进程”。

这位最高司令官除了战争之外，并没有对日本像样的直接经验。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广泛涉猎过有关日本的书籍，除了情报机关的报告书以外。他的确跟学识渊博的、非精英主义的学者交谈过，比如加拿大历史学家和外交官诺曼（E. H. Norman），但是多数“交谈”，最终都会变成他的个人独白。鲍尔斯观察到，麦克阿瑟几乎从不询问他的部下有关日本的问题，而且他当然也不从日本人那里寻求情报。麦克阿瑟经常宣布，他仅有的领路人，是华盛顿、林肯和耶稣基督（前两位的画像装饰

在他东京办公室的墙上）。而且从本质上看来，他是以这样的假定进行操作的：他们4个人一起，再加上天皇的帮助，就能将日本“民主化”。尽管可以将麦克阿瑟的这种信念归为偏见、假设和陈腐的豪言壮语的混合，但是它却没有受到日本或亚洲问题专家们的干扰。事实上，它的确使麦克阿瑟以一种近乎救世主的热诚，全身心地投入到占领初期“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课题之中。[30]

麦克阿瑟在东京的“超级政府”，彻底反映出对特定的地域专家的嫌恶。查尔斯·凯德斯（Charles Kades）上校，是一位在盟军总部民政局担任要职的、典型的新政拥护者，他所在的民政局干系重大，参与新宪法的起草等要务。凯德斯后来坦率地谈起自己有关这方面的背景，他回忆说，“我根本没有任何关于日本历史、文化或神话的知识。我对日本一无所知，除了知道战争中的暴行，以及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领土扩张。我所知道的知识，绝不比一个人从报纸上的日本新闻中所能了解到的更多”。[31]

虽然也有例外，但是基本上凯德斯的情况是典型的。确实，在日常运营层面，统帅部似乎刻意排斥那些哪怕是对日本事务具有些微资格的人。数千名在战争中为担任军政任务而受过日语和日本文化训练的美国人，常常发现自己被派遣到了日本以外的地方。麦克阿瑟和他的手下不想要他们。而那些实际到达了日本的人，有的被调遣到冲绳，简直是美国版的被流放到古拉格（gulag）集中营，在那里美国的策略是回避改革，取而代之的是尽力将曾经战争肆虐的群岛，改建为牢不可破的军事基地。再不然，这些会说日语的聪明而热心的家伙，会被派往横滨的第八师团，担任最基层的占领军任务：地方民间事务。无论他们的最终任职如何，他们都被排除在了制定政策的重要岗位之外。正如最高统帅部内的通天人物西奥多·科恩（Theodore Cohen）所言，“他们被完全排除出了东京”。最高统帅部没有利用这些新进的日本问题专家，而是操作了一场集中的“内部的”人员补充运动，将战争结束时滞留日本的无数“律师、银行家、经济学者、产业技术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罗至麾下。[32]

一位在德国出生并且在德国受教育的法学家阿尔弗雷德·欧普勒（Alfred Oppler），应聘监督日本全部民法和刑法修订的棘手任务。他本

人的任职，足可视为这一排除法则的完美产物。当被一位陆军上校接见时，欧普勒主动坦承，“尽管我精通欧洲事务，但是我对日本的情况毫无所知”。

他的情形真是再幸运不过了。上校回答说：“噢，那样正好。如果你对日本了解得太多，你可能就会有成见了。我们不喜欢日本问题的老手。”[33]

注释：

1 Faubion Bowers，“How Japan Won the War”，*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70 年 8 月 30 日；Bowers，“Japan，1940－1949：A Tumultuous Time Remembered”，*Japan Society Newsletter*（New York），1995 年 10 月；Geoffrey Perret，*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 Life of Douglas MacArthur*（New York：Random House，1996），着重参见 p. 488。麦克阿瑟有关“奉承胜利者”的言论，是在 1951 年 4 月美国参议院联席会议的听证会上发表的，全文刊载于 1951 年 5 月 6 日的《纽约时报》。

2 Bowers（1970）；Theodore Cohen，*Remaking Japan：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ed. by Herbert Passin（New York：Free Press，1987），pp. 100－101。据 Cohen 观察，最高统帅部的高层行政人员到 1946 年 4 月约有 500 人，1948 年 1 月则接近 900 人。

3 Edwin M. Martin，*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New York：America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8），p. 47. Martin 在早期改革方针起草中的重要作用，参见 Cohen 前引书，pp. 34－36，42－47。

4 例如，可参见大阪府编《大阪百年史》（大阪：1968），p. 1257。

5 NHK 放送文化调查研究所，《GHQ 文书による占领期放送史年表（1946）》（东京：NHK，1989），p. 67；日本放送协会编《放送夜话（续）·座谈会による放送史》（东京：日本放送协会，1970），pp. 13，23，27；讲谈社编《昭和·二万日の全记录》（东京：讲谈社，1989），第 9 卷，pp. 176－178（此文献下引为 *SNNZ*）。关于“日本佬”与占领军的媒体方针，参见 Marlene Mayo“The War of Words Continues：American Radio Guidance in Occupied Japan”一文，收入 Thomas Burkman 所编 *The Occupation of Japan：Arts and Culture*（Norfolk，Va.：Douglas MacArthur Foundation，1988）一书，pp. 45－83。

6 有一部不为人知的富有洞察力又机智诙谐的回忆录，即 Margery Finn Brown，*Over a Bamboo Fence：An American Looks at Japan*（New York：William Morrow，1951；由 Charles Tuttle1954 年在东京出版），尤其可参见此书第 5、6 章。

7 Faubion Bowers，“Discussion”，见前引之 Burkman（1988），pp. 203－204。戏谑模仿“被解放的”日本人对“占领军命令”的任何要求都奴性地顺从，可参见 1948 年 2 月的幽默杂志《漫画》，pp. 4－5。

8 悬挂日之丸事件，参见鹤见俊辅等编《日本の百年》（东京：筑摩书房，1967），第 1 卷，pp. 279－282。

9 Cohen，p. 101；Brown，pp. 15 –20.

10 Lucy Herndon Crockett，*Popcorn on the Ginza：An Informal Portrait of Postwar Japan*（New York：William Sloane，1949），p. 186. 这部日本占领期当事者的回忆中，充斥着罕见的种族主义的谩骂，尤其是此书的第19章。

11 Brown，pp. 16 –17；Bowers（1988），p. 203.

12 在 *Remaking Japan* 一书的第5章，除此之外，Cohen 还简明概括了总司令部的其他特征。

13 例如，可参见朝日新闻社编《〈周刊朝日〉の昭和史》（东京：朝日新闻社，1989），第2卷，p. 296。

14 "Babysan"（贝贝桑），是 Bill Hume 在1950年代初创造的广受欢迎的漫画人物，目标受众是在日本的美国大兵。Hume 在占领后出版的漫画集，名为 *Babysan's World：the Hume'n Slant on Japan*（Tokyo and Rutland，Vt.：Tuttle，1954）。日美混血儿的最大的保护者是沢田美喜。沢田是出身日本上流社会的女性，1947年2月她在火车上看到了一个具有半黑人血统的死婴。此后，沢田矢志抚养日美混血的弃婴。1948年2月，沢田开办了一所这样的孤儿院，名为 Elizabeth Sanders Home，主要通过变卖私产维持运营。最终，她帮助许多孩子移居巴西。参见鹤见等编《日本の百年》，第1卷，pp. 293 –296，以及 Elizabeth Anne Hemphill，*The Least of These：Miki Sawada and Her Children*（New York and Tokyo：Weatherhill，1980）。

15 1945年8月2日，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接到最初的"黑名单"指令，要求日本投降后实施直接的军政统治，直到8月30日美军登陆日本时才变更指令。参见 Walter Kreuger 将军对相关军事计划的披露，*From Down Under to Nippon：The Story of the Sixth Army in World War II*（Washington，D. C.：Combat Forces Press，1953），pp. 335 –338。麦克阿瑟可能在数日前得悉指令变更，参见 Marlene Mayo，"American Wartime Planning for Occupied Japan：The Role of the Experts"，收入 Robert Wolfe 编，*Americans As Proconsuls：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in Germany and Japan，1944 – 1952*（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Press，1984），着重参见 pp. 470 –472（注97）。

16 T. J. Pempel 在"The Tar Baby Target：'Reform' of the Japanese Bureaucracy"一文中，探讨了改革对日本的官僚机构无甚影响的观点，此文收入 Robert E. Ward 与 Yoshikazu Sakamoto 所编 *Democratizing Japan：The Allied Occupat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7），pp. 157 –187。对官僚机构的延续性乃至占领期内权力扩张的经典个案研究，参见 Chalmers John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 – 197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17 关于二战中日本与美国敌人相互间的想象，参见 John W. Dower，*War Without Mercy：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New York：Pantheon，1986），以及 Dower，"Race，Language，and War in Two Cultures"，*Japan in War and Peace：Selected Essays*（New York：The New Press，1993），pp. 257 –285。

18 这一指南，在 John La Cerda，*The Conqueror Comes to Tea：Japan Under MacArthur*（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46）一书中有详细引述，pp. 31 –33。

19 盟军最高统帅部对原影片的批评，参见 La Cerda 前引书，p. 48。

20 与影片 *Our Job in Japan* 相呼应，美国陆军部还拍摄了一部 *Your Job in Germany*，由 Theodore Geisel（后来因创作儿童读物“Dr. Seuss”而闻名于世）编剧。这部影片对战败敌人的描绘，是从惯常的“坏的德国人/好的德国人”的套路出发，立场十分严厉。在此片中，德国人的历史而不是德国人的大脑，被认为是德国侵略之根源：这个现代国家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发动战争，并且向其他民族制造田园牧歌式的文化假相。影片强调说，事实上，每个德国人都支持过纳粹；而且每个德国人，尤其是青年人，都是将来潜在的复仇主义分子。这种对德国人及其未来复兴的更为严峻的描述，与 *Our Job in Japan* 一片中的日本人形象，形成了典型对比。这种处理上的差异，部分是因为影片 *Your Job in Germany* 拍摄于德国战败后不久，而 *Our Job in Japan* 的最终版本，则是在日本投降后半年才完成的。此外，还可能有 Geisel 本人的影响（他曾为美国陆军部创作过一部关于日本的更为冷酷的影片 *Design for Death*）。*Saturday Evening Post* 上的文章，发表于 1945 年 12 月 15 日。

21 关于 Grew，参见美国国务院，*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vol. 6, p. 545（May 28, 1945）；关于 Dooman 与 Ballantine，参见 Mayo（1984），pp. 32 – 33，50。Grew 与“日本民众”，参见 Cohen 前引书，pp. 16 – 20。Waldo Heinrichs, Jr., *American Ambassador: Joseph C. Gre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Tradition*（Boston: Little, Brown, 1966）；以及 Howard B. Schonberger, *Aftermath of War: Americans and the Remaking of Japan, 1945 – 1952*（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第 1 章，尤其是 pp. 21 – 28，38。Cohen 注意到许多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都对日本成为民主国家的能力表示怀疑，着重参见 Cohen 前引书，p. 478（注 13）。

22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pan in Defeat: A Report by a Chatham House Study Group*（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5）。强调日本人“顺从的畜群的本能”的观点，总是出现在情报部门的评估报告中；参见“Anglo-American Outline Plan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Japan”（C. C. S. 539/4）of May 1944, box 3, Bonner Fellers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有关“非洲部族”的评价，在不少论著中皆有引述，可参见 Roger Buckley, “Britain and the Emperor: The Foreign Office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Japan, 1945 – 1946”, *Modern Asian Studies* 12. 4（1978）: 567。

23 Grew 的多部在日日记以及其他文献，对此表露无遗。本人也曾经探讨过这一问题，参见 *Empire and Aftermath: Yoshida Shigeru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1878 – 1954*（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79），pp. 104 – 112。对日本下层民众抱有同情态度的“昔日的日本问题专家”，是加拿大外交官、历史学家 E. H. Norman。“巨大的蜂房”的说法，出自一本供美军占领军人员“内部”使用的、长篇大论式（双栏，103 页篇幅）的极其有趣的指南：U. S. Army, *Guide to Japan*（CINCPAC-CINCPOA Bulletin No. 209 – 245；扉页上署期 1945 年 9 月 1 日，但是可能印刷于 1946 年 4 月），p. 65。

24 H. M. Spitzer, “Considerations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Directed Against Japan”, December 9, 1944,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files（美国作战新闻处档案），Record

Group 208, Box 443, entry 378, National Archives（美国国家档案）, Washington, D. C。感谢 Amy Richards 使我有缘得见这份文件。有关“民族性格”的分析，参见 Dower（1986），尤其是 pp. 118 – 146。

25 Theodore Cohen 在其回忆录中将新政的影响作为主线，而且将回忆录之副标题拟为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尤可参照此回忆录 pp. 32 – 48。Charles Kades 后来总结说，做一个“彻底的新政拥护者”，要坚信政府应当干预危机，必要时引入激进措施，但是必须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框架下进行。Kades 的这些言论，见于 Gibney 与 Jigsaw Producions 摄制纪录片“Reinventing Japan”时对 Kades 进行的访谈（未发表），program 5 in the 1992 Annenberg/CPB series *The Pacific Century*；非常感谢 Alex Gibney 向我展示这些访谈记录。参见 Kades 与 Gibney 的访谈，第 2 册，pp. 15 – 16。

26 T. A. Bisson, “Japan as a Political Organism”, *Pacific Affairs*, December 1944, pp. 417 – 420. 亦参见“T. A. Bisson: the Limits of Reform in Occupied Japan”, Schonberger 前引书，pp. 90 – 110。

27 Andrew Roth, *Dilemma in Japan*（Boston: Little, Brown, 1945）。Roth 和 Bisson，以及新闻记者 Mark Gayn，对占领初期的分析颇有洞见，曾经皆被牵连进 1945 年中的所谓“《美亚》间谍案”，此事涉及窃取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参见 Harvey Klehr 与 Ronald Radosh, *The Amerasia Spy Case: Prelude to McCarthyism*（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随后，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成了美国政府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与五十年代初期反共迫害的主要目标。

28 Owen Lattimore, *Solution in Asia*（Boston: Little, Brown, 1945）。1945 – 1946 年，Lattimore 作为赔偿使节团的重要顾问赴日。1950 年代初，他成了麦卡锡主义者在亚洲调查的主要目标。

29 美方在日本投降前的计划和政策的复杂斗争，参见 Cohen 前引书，第 2、3 章（pp. 14 – 48）；Akira Iriye,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 – 1945*（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Mayo（1984），pp. 3 – 51，447 – 474；亲历者 Hugh Borton 的两篇重要记述：“Preparation for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5.2（1966）：203 – 212，以及“American Presurrender Planning for Postwar Japan”, *Occasional Paper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1967）。战时与战后初期许多有关日本的情报书和意见书，颇具分析价值。

30 Edwin A. Locke, Jr.,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总统备忘录），October 19, 1945, box 182, President's Secretary file（总统秘密档案）,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关于“种族的特性”，参见《纽约时报》，1951 年 5 月 6 日；有关麦克阿瑟“在此后的一万年间”的引述，参见 Walter Millis 编 *The Forrestal Diaries*（New York: Viking, 1951）, pp. 17 – 18；麦克阿瑟办公室墙上所挂照片，参见 Bowers（1995）；Perret 前引书，p. 482。

31 Kades 与 Gibney 的访谈，第 2 册，p. 61。

32 Cohen 前引书，p. 104。

33 Alfred C. Oppler, *Legal Reform in Occupied Japan: A Participant Looks Back*（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2.